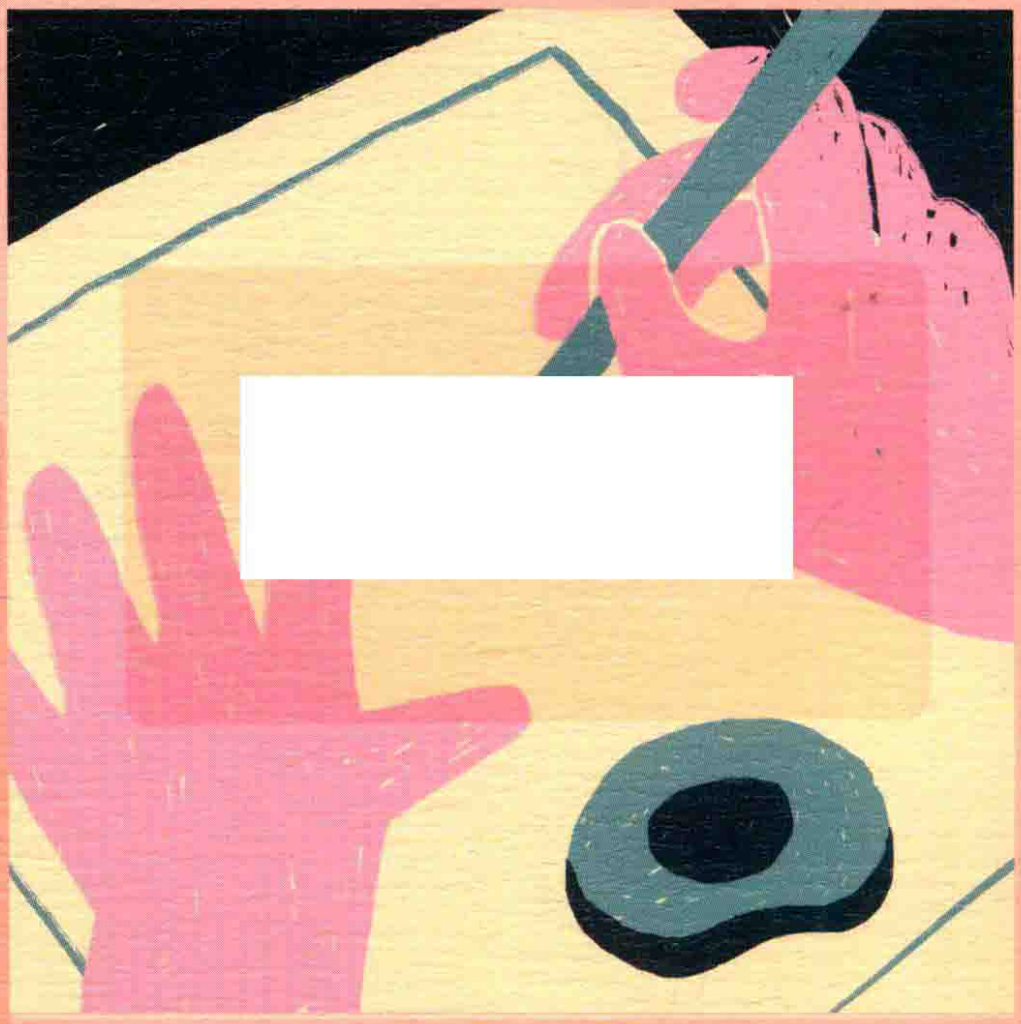
漫说文化丛书·续编

学堂往事

陈平原　林分份 编



CTS | 湖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漫说文化丛书·续编

学堂往事

陈平原　林分份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堂往事 / 陈平原，林分份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6
ISBN 978-7-5561-3253-9

Ⅰ. ①学… Ⅱ. ①陈… ②林… Ⅲ.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6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92367号

学堂往事
XUETANG WANGSHI

领读文化传媒
LINGDU Culture & Media

编　　者：陈平原　林分份
出版统筹：陈　实
监　　制：傅钦伟
选题策划：北京领读文化
产品经理：领　读-孙宏旭
责任编辑：陈　实　张玉洁
责任校对：谢　喆
装帧设计：广　岛 · UNLOOK unlook-guangdao.com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电话：0731-82683313

印　　刷：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2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2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176千字
书　　号：ISBN 978-7-5561-3253-9
定　　价：4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 如何收听《学堂往事》全本有声书?



① 微信扫描左边的二维码关注“领读文化”公众号。
② 后台回复【学堂往事】，即可获取兑换券。
③ 扫描兑换券二维码，免费兑换全本有声书。

● 去哪里查看已购买的有声书?

方法 ①

兑换成功后，收藏已购有声书专栏，
即可在微信收藏列表中找到已购有声书。

方法 ②

在“领读文化”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我的课程”，
即可找到已购有声书。

总序

陈平原

三十年前钱理群、黄子平和我合编的“漫说文化”丛书前五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两年后，后五种刊行时，我撰写了《漫说“漫说文化”》，提及作为分专题编散文集的先行者，我们最初只是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可以送朋友，也可搁在书架上。没想到书出版后反应很好，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十三年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予以重印。又过了十三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重新制作发行。

一套小书，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刊行，可见其生命力的旺盛。多年后回想，这生命力固然主要得益于那四百多篇精彩选文，也与吹响集结号的八十年代文化热、寻根文学思潮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密切相关。时过境迁，这种小里有大、软中带硬、兼及思考与休闲的阅读趣味，依旧有某种特殊魅力。有感于此，出版社希望我续编“漫说文化”丛书。考虑到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黄二位的实际情况，我改变工作方式，带领十二位在京工作的老学生组成读书会，用两年半的时间，编选并导读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散文随笔。

当初发给合作者的编选原则很简单：第一，文化底蕴（不收纯抒情文字）；第二，阅读感受（文章好读最重要）；第三，篇幅短小（原则上不收六千字以上的长文）；第四，作者声誉（在文坛或学界）。依旧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文学史，而是以文学为经、以文化为纬的专题散文集。也就是《漫说“漫说文化”》说的：“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一方面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写景’也不怎么‘抒情’的‘闲话’，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自认为准确的‘散文’定义更有价值。”

考虑到初编从1900年选起，一直选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续编从改革开放起，一直选到2020年，中间几年重叠略为规避即可。两个甲子的风起云涌，鸟语花香，借助千篇左右的短文得以呈现，说起来也是颇有气势与韵味的。参与其事的都是专业研究者，圈定范围后，选哪些作者，用什么本子，如何排列组合等，此类技术问题好解决，难处在入口处——哪些是你想要凸显的“文化”？根据以往的阅读经验，先大致确定话题、

视野及方向，再根据选出来的文章，不断调整与琢磨，最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初编十册分别题为《男男女女》《父父子子》《读书读书》《闲情乐事》《世故人情》《乡风市声》《说东道西》《生生死死》《佛佛道道》《神神鬼鬼》，而续编十二册则是《城乡变奏》《国学浮沉》《域外杂记》《边地寻踪》《家庭内外》《学堂往事》《世间滋味》《俗世俗民》《爱书者说》《君子博物》《旧戏新文》《闻乐观风》，略为比勘不难发现二者的联系与差异。

既然是续编，自然必须与初编对话。明显看得出承继关系的，有《城乡变奏》之于《乡风市声》，《爱书者说》之于《读书读书》，不过前者第二辑“城市之美”从不同层面呈现了当代中国城市的多彩风姿，以及后者第三辑“书叶之美”谈封面、装帧、插图、毛边书、藏书票等，与初编的文风与趣味还是拉开了距离。《家庭内外》的第一、第三辑类似《父父子子》，而第二、第四辑则接近《男男女女》。《域外杂记》与《国学浮沉》隐约可见《说东道西》的影子，但又都属于说开去了。至于《世间滋味》仅从饮食入手，不再像《闲情乐事》那样衣食住行并举，也算别有幽怀。所有这些调整，不管是拓展还是收缩，都源于我们对四十年来中国文化思潮及文章趣味的体验与品味。不再延续《世故人情》《生生死死》《佛佛道道》《神神鬼鬼》的思路，并非缺乏此类好文章，而是觉得难以于法度之中出新意。

另起炉灶的六册包括《边地寻踪》《学堂往事》《俗世俗民》

《君子博物》《旧戏新文》《闻乐观风》，其实更能体现续编的立场与趣味。没有依傍初编，不必考虑增减，自我作古的好处是，操作起来更为自由，也更为酣畅。《边地寻踪》和《俗世俗民》两册，有些话题不太好把握与论述，最后腾挪趋避，处理得不错。最为别出心裁的，当数《旧戏新文》与《君子博物》——实际上，这两册的确定方向与编选过程最为曲折，编者下的功夫也最多。最终审稿时我居然有惊艳的感觉。

比较前后两编，最大的感叹是：前编多小品，后编多长文；前编多随意挥洒，后编多刻意经营；前编多单纯议论，后编多夹叙夹议；前编多社会人生，后编多学术文化；前编多悲愤忧伤，后编多平和恬淡——当然，所有这一切，与社会生活及文坛风气的变迁有直接关系。至于不选动辄万言的“大散文”，以及遗落异彩纷呈的台港澳文章，既是为了跟前编体例统一，也有版权等不得已的因素。

十二册小书，范围有宽有窄，题目有难有易，好在各位编者精诚合作，选文时互通有无，最后皆大欢喜——做不到出奇制胜的，也都能不负众望。作为一个集体项目，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身为主编，除了丛书的整体设计，也参与了各册题目及选文的讨论。至于每册前面的“导读”文字，则全靠十二位合作者。选家大都喜欢标榜公平与公正，可只要认真阅读各册的“导读”，你就会明白，所有选本其实都带个人性情与偏见。十二篇

随笔性质的“导读”，或醇厚，或幽深，或俏皮，或淡定，风格迥异，并非学位论文，不妨信马由缰，能引起阅读兴趣，就算完成任务——毕竟，珠玉在后。

2021年2月1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导读：成长记忆、时代印痕与学人精神

林分份

学堂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化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很大程度上缘于它是学习知识、养成兴趣、孕育人格与传承精神的机构和场所。关于学堂的文章，一般都是作者在结束学业、离开学堂之后所写，时间距离短则一二十年，长则半个世纪以上，称得上清一色的“追忆逝水年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这一类文章蔚为大观。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但凡历史悠久一点的名校，几乎都有一本冠以“老 × × 的故事”或类似名目的文集出版，此外的各种纪念集和散篇更是不可胜数。然而，由于作者的阅历、职业、学养和写作动机多有不同，这些文章的内容、题旨、风格等也就各有面目。当然，本书所编选的是近四十年来谈论学堂的散文篇章，不求全面与完备，只是要求入选的文章至少具备一定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 一

对于一个读过大学甚至硕士、博士的人来说，中、小学时期或许只是漫长阶梯的一小段，然而却是成长过程的重要阶段，其中的求学经历、情感体验和生活百味等，都可能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因而，谈及学堂时，追忆相对遥远的中、小学阶段的经历，就往往成为作者绕不过去的话题之一。

谢冕的中学母校是福州三一中学，他上中学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三十多年后，他对那段被“时局的不宁、环境的多变、生计的困难”压迫的“一连串凄苦的日子”记忆犹新。好在，当时的他将文学当作唯一的安慰，并以此“领略着人世的甘苦”，“追求崇高的人生价值”（《难忘的记忆——我的中学时代》）。黄裳在南开中学度过了五年，那时“整个的学习环境都摆脱不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仿佛头顶一直笼罩着大片乌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暴雨降下”，但半个多世纪后，让他不能磨灭的印象，是“在侵略军的行进声中，听李尧林先生讲授都德的《最后一课》”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南开忆旧》）。

文洁若的两篇文章，见证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中、小学教育的特色与动荡。自1933年至1946年，她先后在孔德学校小学部、日本小学校、圣心学校、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等就学。其中，孔德学校为北京大学的附属实验学校，北大文科教授的子女多在此上学，“五四”以来曾名噪一时，可惜的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随着1937年北平沦陷，“但凡有办法的人都携家带口到大后方去了，孔德学校从此一蹶不振”（《我的小学生活》）。相比之下，北平沦陷时期，德国教会掌管下的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不仅较少受到影响，而且能聘请到一批优秀教师，“就成了沦陷区北平教育界的一方偏安之地”（《我的中学生活》）。

“文革”期间就读于中、小学校的人们，因受到“停课闹革命”、大字报、批判会、武斗等的冲击，短暂的学堂生活留给他们的回忆，大多并不愉快。1968年11月，正读高三的莫砺锋，“刚填好高考志愿草表，就传来了‘废除高考’的晴天霹雳”，他报考清华大学的理想“终于在苏高中的校园里彻底埋葬了”（《五十年间似反掌》）。而张炜直言，短短两年的中学生活，都在搞批判和“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让他“浪费了一个人的一生中再也不会重复出现的、仅仅属于那个美妙年纪的热情”（《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对于一些人而言，动荡时期的学堂也并非一无可取。受“文革”影响，在厦门一中读到初中二年级即辍学的舒婷，多年后坚信“我的个性、气质、道德观，乃至常识性的认知，都来自我非常短暂的中学时代”（《木棉树下——我的中学时代》）。夏晓虹则以为，从1960年秋天开始的小学、初中生活，在北京景山学校所经历的那些“常为新的”教改实验，“奠定了我生命的底色，也导引了我后来的发展路向”（《“常为新的”学校——“文革”前北京景山学校教改实验琐忆》）。

可见，由于家庭因素、所处时代和教育经历等的差异，个人对于中、小学阶段的感受也不尽相同。而这一辑所选的文章中，当事人在忆及早年学堂生活时的幽怀别抱，各有所偏，也足见此类文章的个人性和丰富性。

· 二

正因个人成长与教育经历密切相关，更具专业意味的大学生活，理所当然成为那些学有所成者日后回忆时津津乐道的内容。而在那段已然遥远的岁月中，无论是与母校的结缘，与师长的交流，与时代的会晤，抑或是与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的邂逅，往往都会成为回忆者珍藏的幸运。

抗战时期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汪曾祺，对联大的“民主、自由、开放”以及闻一多、杨振声、罗常培等教授爱才、重视独创的育人之风印象深刻，以至于几十年后他仍然感念那段求学经历：“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西南联大中文系》）1939年秋，错过考期的杜运燮凭着厦大一年级的成绩单和厦大中文系教师林庚的介绍信，被西南联大破例录取进外语系二年级。与西南联大的这次结缘，以及上学期间从闻一多、沈从文等先生那里获得的教益和激励，成为杜运燮后来“经常禁不住要温习”的幸运（《幸运的年月》）。

1963年高中毕业后，余秋雨本拟报考某个外语系，但上海戏剧学院招生的老师告诉他，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学生和巴金的女儿都会是他报考上戏戏剧文学系的“竞争对象”；高校统考后，市招生委员会主任对想要回档案去军事外语学院的他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这些话给了余秋雨不小的震撼，促使他最终选择了上戏戏剧文学系（《我的大学时代》）。而1964年初秋，许道明和八十多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同学相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家很是为自己庆幸，也开始情难自禁地‘了不起’起来”。这些人际遇或有不同，但全然没有比他们晚六七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成色驳杂，“几乎人人一脸的十足神气”，正好因应了“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的时代气氛（《我的大学》）。

十多年后，对于被“文革”耽误了的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而言，进入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尤其是七七级，因系“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积压的人数太多，许多成绩优秀的考生因年龄偏大或家庭成分问题，一开始被取消录取资格，好在有不少学生或家长不断上访，据理力争，使得一些高校通过各种方法补录了一批。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夏晓虹，正是由于北京市破例创行“扩大招生”的办法，才有幸终于在1978年3月初的一天，踏进她“向往已久的北大校园”，当然，录取的条件之一是“走读”（《我的走读生活》）。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

的陈思和，同属第二批录取的走读生，当时“仅中文、数学两个系招生，是4月份进校，插入新生班上课”（《遥忆大学路》）。向往复旦大学新闻系、中文系的许纪霖，成绩虽高，却也是补充录取，“唯一让我美中不足的是，录取我的是华东师大的政治教育系”（《我的大学时代》）。

正因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七七级、七八级的同学一进大学就人人一门心思发奋读书。除上课外，他们几乎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不分寒暑在路灯下熬夜苦读，大清早赶到书店门前排起长龙买文学名著……“连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一进食堂就拣短的队伍排”（韩小蕙《上大学！上大学！》）。对于这代人而言，如此努力的好处，是大学不仅让他们获得了一把开启知识之门、智慧之门的钥匙，懂得了独立思考的可贵，而且塑造了他们的人格和精神，对于他们后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自恢复高考以来，四十多年间中国已经培养了多达数百万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近年来谈及硕、博时期“幸运”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可谈这两个时期的文章本书选得极少，原因是一旦涉及硕、博阶段，重心很容易就滑向更为专门的学术训练、更具专业背景的师生互动等，而“学堂”也很容易被更为具体的“院（系）”“研究所”乃至“师门”稀释与代替。换句话说，这一类的文章极容易变为有关个人学术成长史的自

述，虽然也能做到各有面目，但其可读性、趣味性也就不容易保证了。

· 三

一所学校的整体风气，以及校园中的师生关系、同学情谊等，往往会影响莘莘学子对于母校的印象，而健康、积极的印象会成为他们日后不断追忆与回味的内容。张中行的“红楼点滴”系列，回顾了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之风气，在三十年代初的北大校园无孔不入。其表现之一是“课堂的随随便便”，学生“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红楼点滴一》)。而教师的教学也各具风格，比如孟森每次上课都自顾自念讲稿，伦明对上下课的钟声从来都听而不闻，林公铎开课讲“唐诗中的陶渊明”，钱玄同坚持每门课不判考卷等(《红楼点滴三》)。在学术自由方面，教员既以身垂范，也鼓励学生勇于坚持自己的见解，整个校园充斥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空气(《红楼点滴二》)。

这种自由、开放的风气，一度使得北大师生之间的关系看起来略显“疏远”——除个别外，学生很少听了某教师的课以后还登门求教的。1921年至1927年就读于北大德文系的冯至，对此深有感触：

日子久了，我很少看到一个教授或讲师对学生耳提面命，更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学生程门立雪，表示求教的虔诚。我个人在北大六年也从来不曾想过，认谁为业师，更谈不上我是谁的及门弟子。那么，我所得到的一知半解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回答说，是北大开放了的风气给我的。(《“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

实际上，这种开放、自由的风气，深深地影响了北大学子。

塑造和影响学生的，不仅有学校的整体风气，更有来自老师们的品行、才情和魅力。来新夏对抗战时期辅仁大学的主要印象，是在此任职的诸位名师，“从无一人自命为大师而表现傲慢，对学生循循善诱”，“都承担教学与辅导工作，亲自改学生作业与笔记，发还时同学间争相参读老师的批语”(《我的辅仁四年》)。而七七级的朱寿桐对苏州大学的深刻印象，则在于老师们“治学的成就和高超的讲课艺术，连同他们正直善良的为人，带着各具特色的声腔和表情”等所形成的魅力(《母校杂忆》)。

此外，谈论对于母校的印象，像黄天骥难忘入学中山大学第一天同系师姐的温暖情谊(《话说“迎新”》)、叶兆言感慨南京大学学子的苦读传统(《对母校的记忆》)，这一类的文章为数众多，也各有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但本书也只能尽力别择，适当选取。因为无论追忆师长的嘉言懿行，抑或回味同学的深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